

延安的日本傳聲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八

後學小日本行實

——日本經濟發展之研究——

虜俘本日的安延
——八之戰挑的國中色紅——

著因坦史・室根
譯 桃 谷

延安的本日俘虜

——紅色中國之挑戰——

著 史·G 坦 田

譯 谷 桃

出版者 晨 社
經售 各大書局

•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
版權所有

目 錄

一	穿上了中國制服的日本人	一
二	給戰敗的日本一個綱領	二

一 穿上了中國制服的日本人

客人是美國軍事考察團和幾百個延安新民主政治中的領袖和一般百姓……

主人是七十個日本人——不久以前是日本皇軍的士兵，現在都穿上了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的藍色棉布制服……

表演戲劇給我們取樂的地方是用各種各色旗幟華麗地點綴着的延安人民參議會的會議廳。

和聯合國旗幟並排的是一面以前我從未見過的旗子——一面上左角是一顆黃星，下半部是一條白色橫條的紅旗。

戲台上站着一個矮小的，莊嚴的日本人——岡野進，日本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以前是倫敦經濟

學校的一個學生，久經日本牢獄生活和從事反軍國主義地下工作的老手——將來也許會在戰後的日本發生作用的一種運動背後智囊。

『我代表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延安日本農工學校——與日本國內反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地下戰鬪者，』他用流俐的英語說着，『歡迎我們協約國的朋友們。』

『爲着要完全地和永久地消滅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協約國的武力當然是決定的因素。但是還有其他力量的重要性也是不可低估的：那就是，在日本佔領地區和日本殖民地的人民力量；與那些反法西斯的日本在野黨的力量。』

『那些在野黨的黨員勝於共產黨的黨員和它的同情者。它包括工、農、知識份子，與其他政見的小商人。但是它依然是脆弱的，因爲它缺乏統一和組織。一直，祇有日本共產黨曾經堅決地始終如一地努力反抗着軍國主義。』

『使在野黨統一起來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鵠的，這同盟是由已經轉變成爲反軍國主義和反法西斯的日本戰俘在中共管轄地區內建立起來的。我們正爲了要統一而在組織着，我們的基礎不是共產黨，而是民主，因爲這樣才能把所有反法西斯主義和反軍國主義的人們集結起來，鼓舞起來……』

『我們一面把我們的影響努力擴展到日本本土去，一面我們是在工作着，是在實際和中國共產軍緊密合作着打擊在華的日軍。』

「我們希望你們的蒞臨此地將提供我們一個機會和協約國政府和世界各國有一次初步的接觸，如此我們才能幫助完成打敗和消滅日本軍國主義的共同目的與建立一個真正和平民主的日本。」

「所以我們的集合在此具有着特殊的重大意義。我希望就在今天晚上——在我們的學生正要表演的戲劇中——你將呼吸到一些未來日本的氣息。」

「並且我希望下一次，我們將可以請你們在東京的帝國電影院觀看表演……」。

觀眾里有好幾百個中國人，軍隊，黨派，政府領袖們和各式各樣的人們，他們都報以熱烈的鼓掌。

巴勒忒上校致了短短的答詞：

「美國軍官們可能從未經歷過這樣異常，這樣有趣的情景，像我們今晚的一樣，」他說着，向下望着他的美國軍服，帶着特有的露齒微笑，那微笑甚至使他最嚴肅的話也變得生氣勃勃起來。

他講到了美國軍事考察團的工作和他的日本主人們能夠幫助美軍將這些工作實行出來的方法，因而獲得戰勝日本的戰爭。

「我很高興地說，」他結束了中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的興奮的鼓掌，「岡野進先生和日本反戰組織已經在我們延安方面的工作上提供了寶貴的幫助……」

日本士兵們爲我們演出的戲劇真切動人而又富有教訓。

第一齣戲是「憲佐島田」，岡野進說它是根據一九四三年所發生的二件事情，用一種寫實的手法刻劃着一部份已由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前線一直作了好幾年的工作。

第一幕。在八路軍地區和一個日本陣地之間的無人之境。一羣士兵：穿着日本制服的島田憲佐已受了傷，在數月前作了俘虜；有幾個中國士兵和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會員則穿着八路軍的制服。

島田在八路軍醫院里住了三個月，他感激每一個在這期間優待他的人：「我們在日軍中聽人說你們殺死囚犯。但是我的回去將表示給他們看這不是真的。我高興你們明白了我要回到我的部隊里去的願望，雖然你們告訴了我日本的軍國主義，我仍要如一個愛國者一般地盡我的責任。」

一個中國農民領了他去，到日本人那邊。

第二幕。在一個被佔領的小鎮上的日本大隊長的房間里。幾個日本人和漢奸正在商談分配他們剛從老百姓那裏偷來的贓物。

島田進來了，向大隊長述職覆命。他說明了所遇到的事情和指出了他膀上的槍彈傷口。大隊長叱斥他爲了他給活活地俘虜去因而污辱了皇軍。他的名字已從部隊名冊上劃去了。他被當作死了好幾個月了。他是應該自殺的：「渾蛋……你今天晚上必須死去。」

第三幕。一羣日本兵在他們的營房里。島田將他的故事告訴他們，將八路軍的印刷品給了他們，還唱了一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歌給他們聽。

「他們並不像我們的長官告訴我們那樣地殺死俘虜」，島田說，「亦不像我們自己一樣地時常殺死俘虜。」

「這是八路軍總司令的命令：（一）嚴禁傷害與侮辱日俘，（二）予受傷者以特別看顧。（三）凡欲歸原部隊者必須遣回。（四）凡欲留此與我們共同工作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或與我們一起研究者必須助其成功。（五）凡欲寫信與日軍中之同志或家族者必須予以郵遞之方便。」

「他們待我很好，看顧我，還教了我許多東西。我們自己的同志在被俘虜後便決定和他們一起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他們認為我們的理由是不正當的。他們可能是對的。我還不十分確定。但是我感覺到我不必回去盡我的責任。」

有的兵在厭惡島田的稱讚八路軍，有的兵似乎漠不關心，但是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人是對於他的經歷發生了一種興趣。

第四幕。仍是那些兵，沒有了島田。他們在大隊長帶着一個軍曹進來搜尋島田的時候，都對他們所得的不好食物和待遇以及大隊長的兇暴抱怨起來了。

兵士們都不承認看見島田，因而受到了刑罰，按照皇軍的慣例用非常精細的方法瑣碎地，卑鄙地拷問着。當他們又單獨下來的時候，兵士們憤怒地商議着向大隊長復仇的方法。

最後一幕：一個日本防舍前面的空場上。兵士在值夜。島田和他們同在，向共產黨區域渴望地會

在戰爭初期由朱德將軍發給八路軍的命令。

視着。

一個中國農夫從他鄰村傀儡村長那里帶來了一個消息，警告日本人共產黨將對他們的防舍有一次猝不及防的突擊。但是他也帶給島田和其他的人那些放着小小禮物的「慰勞袋」，關於世界形勢發展的消息報，和宣傳的印刷品，這些全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有系統地偷偷地運進了日軍裏面來的。

遠遠地聽到了許多聲音：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一隊宣傳隊隨同前進着的八路軍通過了擴音器高呼着反軍國主義的口號。大隊長來到場上，隨即命令猶疑不決的兵士們開火。島田叫了起來，「不要打他們……」

大隊長注意了島田，手鎗向他指着，在大隊長能夠放出之前自己却給他的一個兵士殺死了。

另一齣短劇的根據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中的一個人的個人經歷，他本人就在台上表演。這個戲速寫着東京貧苦區域里的一幕。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在那一個有歷史意味的日子里，杜立德將軍向日本投下了第一顆炸彈。

這齣戲懲罰了在襲擊中的一個標準的東京警察的畏怯以及極端愛國的獄卒的偽善，也描寫了一般百姓的混亂和無援的失望，並指出了唯一能使他們解除痛苦的方法——反對軍國主義。

一枚炸彈，印有一面美國旗為標記的落進場上——像一個解放的象徵——擊中了警察要想躲避的地方……

「這完全是奇怪的」一個美國軍官對我說。「這些日本人似乎真的要他們的國家給炸毀呢。他們真和我們所想像的一切日本人有如此的不同麼？」

「你要日本給炸毀麼？」我詢問着一個日本人。

「當然」他微笑着：「因為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是不能打敗我們的軍閥的。他們是我們人民的敵人。」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共產黨管轄下的中國約有四百個活動份子，他們大多數是在前方工作，但是有幾個却在延安日本農工學校和戰區分校里讀書和教書。（岡野進當然不能將淪陷區和日本國內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組織上的接觸公開出來。）

共產黨管轄下的中國的一羣中有三十多個人在過去幾年的抗日鬥爭中被殺死了。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八路軍和新四軍所捕獲的俘虜，大部份被遣回日軍，合計佔總數二四〇〇多人中之二〇〇〇人左右，」岡野進說，「因為他們要回去。但是，現在每一個月，俘虜破天荒地逐漸多起來了。除了那些數字，還有一個相當大的人數正在到我們的訓練學校來，有更多的人俘虜依然在各處戰線上。」

※在一九四五年初期，共產黨的日本戰俘的總數，增加至三八八〇人；自一九四四年九月以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活動份子的數額推想起來亦有極大的增加。

「現在他們大多數不再要回去了。他們知道最近日本底命令：立即殺死回來的俘虜，因為他們常常要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和中國共產黨員開始在軍隊中影響士氣的事情告訴他們的同志。所有的俘虜現在都被留了下來並且被送到了學校里去。我相信他們全都能被感化過來的。」

「我想沒有什麼事情再要比改變日本兵士的意識更困難的了，」我說。

「這並不如此困難，」岡野進說。「雖然常常要化上幾個月，在有些棘手的情形中甚至要化去一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我自認我自己亦感到驚奇，因為使感化工作獲得成功比我本來所預計的要容易得多。這一部份當然由於我們是在有利條件下在中共的新民主政治下工作。這些對於我們所教的學生是一個活的證明和實例。」

「他們生活和工作在這個他們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一種自由的氣氛里。正同你所見到的一樣，八路軍並不把他們當作俘虜。他們僅是軍事學生而且和中國的軍事學生有着同樣的自由，穿着同樣的制服。這件事本身使他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學校里和轉變過來的人們在一起，那些人曾和八路軍在前線共同作過戰，現在爲了要提高他們自己的資格而在這裏唸書。那些前進學生的真正反法西斯的熱忱對於新來者是一種最有力的影響。」

「一般地，當他們自己的同志熱切地用他自己發現了的理論上的新的真理去說服他們，使他們生平第一次地思想時，這些俘虜對於皇帝的神聖子孫的信仰和日本意識的全部系統很快便毀滅了。至於

教師們，因為做過普通兵士，而且也和他們一樣准來的，所以很理想地合格地來幫助這輩新人。」

「你認為你所有的轉變者都是可靠的嗎？」

「不，有些是不可靠的。但是別的同學和教師却緊緊地觀察着他們。他們要確定他們的成果而且能夠判斷每一個人的忠實性。他們對於那些尚未堅定的，或者祇是假裝着在丟棄舊意識的人是忍耐力繼續工作着。你必須明白他們是不用壓力的。學生思想的轉變，準備戰爭或戰後工作的理論和實踐的學習過程中自然而然地發展着。」

「對於大多數學生，這是他們從未有過的真正教育：百分之三十四是工廠工人，百分之三十二是農民，百分之二十一，是小商人和職員，這些人在剛加入軍隊的時候很少知道什麼東西。在他們年青時給諄諄教誨了的迷信，在獲得我們的實際智識之後不能再存在了。」

學校，在延安中心的一排排整潔的窑洞里，有七十個學生。我訪問了他們好多次，而且至少和十幾個學生作了個別談話。他們似乎和我在日本所認識的同類的人全然不同。

他們對於我的問題底回答使我有了一個印象，他們並不是機械地把他們的日本帝國主義改成了循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路線的馬克斯的唯物論，而是以他們新的意識，學會了自然地合乎邏輯地去思考。

他們真快樂在這學校里找到了瞭解過去他們不能解答的許多問題的鎖鑰。他們中間有幾個使我想

起了我在蘇聯遇到的新近才識了字的成人們，他們相當驚奇：那幾個月的課程竟能那末突然地使「幾張報紙告訴了他們各種新的有趣事物的故事」，有一次，一個由農民變成的工廠工人這樣告訴我。

大部份的學生已在前線工作了——在日本戰線附近作「廣播宣傳」指導中國軍隊練習日本陸軍戰術，教他們運用截獲的日本步鎗和臼炮，協助情報工作，以及在新俘虜身上進行工作。

他們在延安爲了要進一步的研究，選讀探敵情報學科，學習改良宣傳方法，增長他們對日本的政治和經濟智識，同時他們準備去教那許多在共產黨反攻開始時會落在中國人手中的俘虜——爲着要使他們儘可能地成爲軍閥敗北後日本人民解放同盟要在日本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先鋒。

「這也是協約國應該對他們的日本戰俘做的」，岡野進說。「戰後在將他們遣回之前，要教育他們有民主思想。」

「每一個回去的俘虜如果不瞭解在日本必然會發生的變化，那末他們便會成爲反協約國的，和反對促進那些變化發生的進步份子底一股力量；但每一個人都像我們的人們那樣帶着新的觀念回去的話，那末就會使成千地人民爲着一個和平的，民主的日本，也爲着日本和民主世界的合作而積極地工作

……」

二 給戰敗的日本一個綱領

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員把岡野濤看得很高，認為他是完全可靠和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們把他當作他們中間的一個，而且好像經常地和他商討着有關於日本的重要事情。他的辦公處設在八路軍總部，他和他的中國妻子住在朱德將軍鄰近的窑洞里。在延安領袖們出席的重要活動中，他好像是沒有一個不出席的。

在聯合國目的四萬人的一个羣衆大會前，他那篇用「中日人民團結萬歲」的吶喊來結束的演講博得了極大的掌聲。他在延安的人民間是著名的，很受愛戴的，正像可以在鎮上自由走動，而且有一二個人已被當選爲邊區人民參議會的議員的日本農工學校底學生們一樣。

岡野進——五十歲左右的一個沉靜的男子，他的真名字叫鐵野坂——他不是那些想以微笑，虛偽的謙遜，和過到的禮貌來給外國人留下印象的一個日本人。他亦沒有大多數日本人所有的習氣，比如，吸進了一口氣，隨後就長地噓出了一聲「殺」——顯然地，這是他想獲得時間來對任何問題作一個最模糊的可能的回答。他是爽直的，坦白的，而且在他細心分析日本的事物里，他差不多是忘我的，——冷靜，乾脆，有條不紊而且絲毫不差。

岡野進穿着簡單的延安棉制服，他的外表在我看來近乎是一個沉着的，略帶迂闊的事務執行者或是卓越的科學家，而不像是一個久經牢獄和地下生活的職業革命家。

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他在歐洲的旅行，他在莫斯科的多年居住，（他在莫斯科代表日本共產黨出席了共產國際）給了他一種四海爲家的眼界，這種眼界就是在遊歷得最廣的日本人中也是難能可貴的。

由於他的忘我的態度，要過了許久之後才得瞭解他，可是我愈看見他，愈聽到他的意見，我就愈要信任他的真實報道，和那支配他人格的責任感。

今天在日本國外，岡野進要算是對本國將來發展有重要關係的唯一的日本人；當然，他是絕不被疑心他也是幫助過日本軍閥的少數日本政客中的一個。他似乎是國外的反軍國主義者，而仍能與國內保持聯繫的唯一日本人。他的組織也許可能在日本軍閥潰敗之後參與改變日本政治性格底改革運動。